

少數民族教育史

第四卷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中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云南编委会 编

◆ 主编 冯春林 黎寿福 陈庭贵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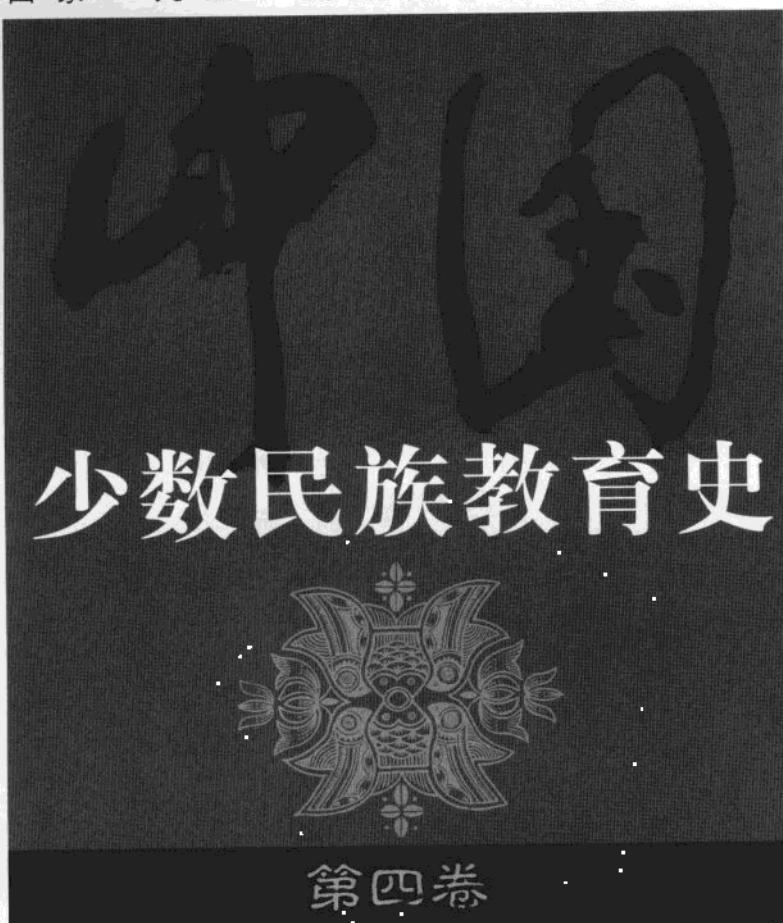
中国
少数民族
教育史

ISBN 7-5415-2094-2



9 787541 520945 >
定价：173.00 元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云南编委会 编

◆主编 冯春林 蔡寿福 陈庭贵

◆云南教育出版社

◆广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第四卷/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云南编委会编；冯春林、蔡寿福、陈庭贵主编.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 11

ISBN 7-5415-2094-2

- I . 中…
- II . ①中…②a. 冯… b. 蔡… c. 陈…
- III . 少数民族教育 - 教育史 - 中国
- IV . G759. 2

本卷由云南教育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云南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西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650034
深圳（宝安）新兴印刷厂印刷
(深圳市宝安 71 区进出口贸易公司大厦 1-3 楼)
850×1168 毫米 16 开本 65.25 印张 1 500 000 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7-5415-2094-2/G·1650
定价：173.00 元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云南编委会名单

主编：冯春林 蔡寿福 陈庭贵

编委：（按书中族别顺序排名）

陶天麟 薛丽云 张文华

何大昌 丁惠兰 雷 兵

陈兴华 郭 愉 盖兴之

肖淑琼 王 峥 符明弘

王 珩 李家英 张先明

总 序

伟大的祖国——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各族人民携手并肩，经过长期的自然斗争、社会斗争，共同开发锦绣山河，缔造了漫漫 5 000 年的辉煌历史，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除汉族外，我国现有 55 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分布地域却占全国总面积的 50%~60%。他们大多居住在偏远边陲，沿东北边陲逆时针转，直至台湾省，略呈“C”形绵延而布；内有跨国而居民族 31 个。这种地望分布，决定了少数民族在保卫和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拓通内外交流和友好关系等方面，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然而，鉴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一般地讲，边疆逊于内地，少数民族逊于汉族。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好广袤的民族地区，做好边境工作，对于促进全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意义。可以说，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和繁荣，就不可能实现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

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国家的振兴，民族的昌盛，应以教育为本。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邓小平曾在 1983 年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战线任重而道远。出于培养民族人才的紧迫感，毛泽东早在建国伊始就明确批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

韩 达

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民族教育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为此，古往今来都较滞后的民族教育，更当奋起直追。

值得注目的是，民族教育既有不少相通于全国教育的共同规律，也有许多独守不群的特殊规律。这些特殊规律，是自千百年间形成赓续而来，必有其历史的、现实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从这一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掌握和运用各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规律，对于全面鉴古观今、深入研究和掌握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发展及其规律，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意义。无视或忽视这一点，必难找到堪称“中华民族教育”发展的完整的脉络，自然也必难写出科学而完整的《中国教育史》。而问题正在于，实际情况却未能尽如是意。少数民族教育如此纷异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迟迟未有必要的考察、研讨和反映，实属历史的失误和偏颇。

我们感到庆幸，当今中国教育界或教育史学界中，许多有识之士业已达成上述共识。早在1979年冬，中国教育史研究会成立之时，就决定组织力量研究、纂修《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然而，偿还这笔不轻的历史旧债，却非易事，纂修任务经年累月难以落实。作为中国教育研究战线的一名老兵，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我深知，偿还文化领域的历史欠债，带有抢救性质，迁延日久，难度逾甚。为此，我自1990年起，毅然发动并组织先期筹划。经奋斗两度寒暑，至1992年6月25日，人们企足以盼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经国家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立项，正式获准上马。当时，上马经费拮据，人力不济。我旋以耄耋之年，奔走全国各地，求得各方支援。于是，这一光荣、艰巨、浩大、系统的民族教育研究工程，终于赫然启幕。

如上所述，我国少数民族及其教育，向来发展不平衡；而其教育史的研究，更是底子薄、起点低，普遍滞后。不少民族的教育史研究，既无古典文献可考，也乏口碑访录可稽，只能从头做起。如，云南学者承担的该省独有11个民族的教育史，即为破天荒的滥觞之作。如此开拓性的教研巨制，从初稿构架撰写，到稿文一统整容；从史料鉴别筛选，到成稿审定把关，其繁其难，又曷可胜言哉？须知，上马只解决了硬件难题，而更难的是上马后的软件障碍——民族教育史的若干学术问题。举其大端盖有：

一、关于民族教育分类

教育类型的划分，对于一般的教育史来说是并不困难的；而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极不平衡，教育发展千差万别，其分类却难统而划一。

要在民族教育史纂修中，对其多彩教育进行科学分类，恐需通横达纵，就差论别：既看历史横断面上各民族的教育水准，又看各民族历史纵剖面上的教育进程，经纬交织，而以“史”贯之，酌予特殊的厘定。基于同样原因，加之可考文献资料甚少，这种厘定难免语焉不详，只能粗略为之。鉴此，我们便从“大教育”出发，循“各族史”而行，爬梳为如下诸类，即：原始社会残余形态的原始教育，奴隶社会形态的初级文明教育，封建社会形态的多

元教育，近、现代学校的正规性教育，革命根据地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学校规范化教育，等等。

在古往的历史纵面上，各民族受中央政权的管辖情况颇多不一，其教育所受辖制和影响亦大相径庭：按王朝一统要求兴教授业者有之；循本民族特有模式自行其“教”者有之；王朝一统教育与民族模式并行不悖者有之……纂修民族教育史，既应沟通现行《中国教育史》，更应着眼于各民族特有的传统教育，诸如：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劳动教育，立足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生活、风习、德行教育，伴随不同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教育，以及服从特殊生存发展需要的畜牧、射猎、征战的骑射教育，等等。这些教育，多以社会实践和家族传承形式为之，或以学堂（学校）、寺庙授业等渠道进行。其中，表现为“以育人立世为主旨，以目染耳濡为能事，饱涵族群色彩的整体社会的日常教化”，在各民族教育发展中，沛然各扬其长，尤为重要。作为民族特色的教育，自当着力书之。

在现、当代历史横面上，革命根据地及建国后的民族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灿然一新的民族教育。从“量”的规模来讲，它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翻倍增长，乃至零的突破；从“质”的品类来讲，它实现了跨越一个或几个世纪的历史性升华，走上了真正的人民教育之路和科学的民族兴教之路。作为民族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在延安创办了民族学院；建国后更相继创办了西北、中央、中南、西南、云南、青海、广西、广东、贵州、西藏、东北、西北（第二）等民族院校，首开民族高等教育之先河，使民族教育终于全面跻身多层次、多学科的现代规范化教育之林。民族教育如此壮丽的长足跃进，更当椽笔浓墨，大书特书。

二、关于历史分期

这里所说的“历史分期”，是指《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的历史分期，与现行《中国教育史》的历史分期的关系问题，亦即民族教育史的“断代”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各少数民族地区并存着多种社会形态，自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制（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溯至农奴制、奴隶制，乃至原始公社末期，几乎史有尽有。其发展进程，普遍后于内地汉区；其结构也异常复杂，极不平衡，甚至同一民族因分布地不同也殊异。这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略同汉区，已进入封建社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回、维吾尔、苗、壮、布依、朝鲜、满、侗、白、土家等30余个民族，蒙古、彝、黎等族之较大部分，以及藏族之小部；二是尚存封建农奴制或封建领主制，如藏、傣、哈尼等族之大部或部分；三是尚存奴隶制，如大、小凉山的彝族；四是尚存原始公社制残余，如傈僳、佤、景颇、独龙、基诺、怒、黎、高山、鄂伦春、鄂温克等族之部分或小部。他们的政治制度复杂纷繁：有的辖从于历代中央王朝；有的则各自为“政”，如西藏藏族的“政教合一”、凉山彝族的“家支”、西双版纳傣族的土司制度和残存原始公社制民族的“长老政治”，等等。

各民族如此杂沓的历史进程，实难划一于中央王朝的历史分期。相应地，其教育史的历

史分期，就只能从各民族实际出发，分别酌处：凡能参照朝代史划分者，按朝代史记述；否则，按大的年代史、世纪史划界；上溯数百、上千年，社会形态无大的质变，查无明确断代界限者，则统称曰“解放前”的教育发展史。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民族教育的历史发展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本书力求如是，也只能如是。

三、关于地望分布

这里所说的“地望分布”，是指本书如何处理各少数民族地望分布，与历代中央王朝行政区划的关系问题，亦即民族教育史的地望定位问题。

时间是空间的历史；空间是时间的地望。史、地如影之随形，密不可分。修史必涉地望。各少数民族的分布状态，历来十分复杂。纂修各族教育史，必须弄清其社会活动地望。而各族活动地望却变迁无常，有的尚可观照历代的行政区划，有的则因区划史料过略或遗缺而无从考究。鉴此，本书只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范围为基准。按其行政区划去大体指代某族彼时活动之彼地。其中，在历史上曾一度或一再迁徙者，逐次注明其变迁路线，庶几与《中国教育史》的地望同步对接。

我国少数民族的地望分布，宏观可谓“大杂居，小聚居”，自古而然，鲜见例外；微观细而分之，可胪三类：一是大集中、小分散，如蒙古、回、藏、维吾尔、壮等族；二是小集中、大分散，如苗、彝、布依等族；三是全民族聚居于一二省区的局部地域，如裕固、独龙、鄂伦春、基诺等族。就人口布局而论，55个少数民族中，除大部分聚居边疆和民族自治地方外，还有回、满、蒙古、朝鲜、苗、瑶、畲、土家等民族的约1000万人杂居、散居在全国各地城乡。

针对上述民族分布状况，除聚居一地者外，本书均以其集中部分为研究主体，解剖麻雀，略窥其概；同时兼采其分散部分之特色精华，以周其全。如，蒙古族教育史，以内蒙古的蒙古族教育为主体，兼及青海、新疆等省区；壮族教育史，以广西的壮族教育为主体，兼及云南、广东等省。

此外，还有一些学术问题，堪称民族教育的特中之“特”。如，双语教学手段、寺庙经院教习、多元文化影响，以及民族心理濡染，等等，本书则按特殊矛盾作特殊分析，或略或详，或聚或散，平实、审慎地记述之。

上述学术问题，经编委及作者各方悉心研讨，锐意攻错，现已大体化解。尤为幸者，率先成书、尚带试编色彩的这些书稿，业已得到各方人士的热情肯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审稿，明文鉴定道：书稿“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历史，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在资料缺乏，可资借鉴的史料不多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绩是可贵的。它们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某些方面的空白，均达到了出版水平”。书稿相应的一些民族地区，还专门举行学术讨论，赞之为该“民族教育研究的新成果”；有的民族地区，还授之以“科研一等奖”。

卷帙浩繁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先行出版的凡三卷，约 550 余万字。它涵盖了蒙古、回、藏、维吾尔、彝、壮、布依、朝鲜、满、瑶、白、土家、哈萨克、傣、黎、高山、东乡、纳西、达斡尔、仫佬、羌、毛南、保安、裕固、京、基诺等 26 个民族的教育史。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一卷，收集了《回族教育史》、《维吾尔族教育史》、《朝鲜族教育史》、《满族教育史》、《哈萨克族教育史》、《东乡族教育史》、《达斡尔族教育史》、《羌族教育史》、《保安族教育史》、《裕固族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二卷，收集了《蒙古族教育史》、《藏族教育史》、《彝族教育史》、《白族教育史》、《傣族教育史》、《纳西族教育史》、《基诺族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三卷，收集了《壮族教育史》、《布依族教育史》、《瑶族教育史》、《土家族教育史》、《黎族教育史》、《高山族教育史》、《仫佬族教育史》、《毛南族教育史》、《京族教育史》。暂未列入的其余 29 个民族——苗、侗、哈尼、傈僳、佤、畲、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布朗、撒拉、仡佬、锡伯、阿昌、塔吉克、普米、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族的教育史，敬祈民族教育战线等有关单位，继续组织专家、学者纂修，以使本书能囊括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古今教育的发展丰姿。

平心而论，本书的纂修出版，对于中国民族教育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学界，必将作出显著的贡献。首先，它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的学科体系，拓展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现行中国教育史的一大空白。其次，它有利于弘扬少数民族教育的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深入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再次，它从少数民族教育的实际出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民族教育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决策的依据。此外，它还锻炼了一支少数民族教育史的科研队伍，增强了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后劲。

这部异彩纷呈的教研巨制，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晶。付梓在即，我格外难忘各方仁人对本书的参与和扶持；广东、云南、广西三家教育出版社慧眼高瞻，始终鼎力支持出版；山东曲阜市巾被厂孙钢梁厂长等，热心民族教育，慷慨出资匡助；京内外 40 余位专家学者，民族教育战线诸多领导、管理干部，争相奋袂应援。没有他们殚精竭虑的参与和扶持，断无今日之成就。我还要特别提及，陈声远、李彦福、韦善美、孟作亭、张为珍、栗洪武、赵一兵、熊明安、冯春林、马加林、李耀宗诸方家，为组织、撰写和支持出版，倾注殊多辛劳；国家民委教育司组织专家审稿，严格把关，体惜入微。在此，请让我一并鸣谢！

古语云：“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本书旷古“始生”，舛讹欠当之“丑”，或不鲜见；文稿通贯之失，在所难免，令人喜中隐忧。这里，我谨代表编委会，恳请广大读者、同行，不吝赐教，俾既出之卷日臻完善；也恳望有关省区人员等，协力有加，修竣未就之卷，以使本书早日完璧。

本卷序

杨崇龙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山区省，山区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94%。它与越南、老挝、缅甸 3 国接壤，边境线长达 4060 公里，有 15 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据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云南省有 52 个少数民族，其中 4000 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 25 个。少数民族人口有 1234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33.4%，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13.5%。全省各少数民族 15 岁及 15 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总数的 29.7%，有 12 个民族在 30% 以上，最高的为拉祜族，达 45%。云南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在全国各省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广西。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极广，基本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全省 127 个县市都有少数民族分布，无单一民族的县市存在。从大的方面来看，云南民族多、山区多、国境线长的特点决定了少数民族教育的复杂性及其在云南省“四化”建设中的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由于云南离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国也较近，故它还有深远的国际影响。从小的方面来看，云南的少数民族教育本来就是云南教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云南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上不去，那么各相应民族的整体素质就上不去，整个云南教育的发展也将受到制约。换言之，只有各少数民族均实现了普及六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云南省才可能真正实现扫盲这一目标；只有各少数民族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目标范围内，云南扫盲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总之，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整个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



云南学校教育的发展历史虽比中原晚了许多年，但不管怎么说，自汉元和年间办学以来，至今也有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教育在 1949 年前的一千多年里，发展步履极其艰难，速度极为缓慢。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的教育才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时间为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此前一千多年来历朝历代所做的一切！据 1994 年的统计，各民族的在校生与 1952 年相比，大学生增长了 34 倍，中学生增长了 53 倍，小学生增长了 5 倍。由于党和政府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方面给予了诸多政策倾斜，故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不但使那些曾处于刻木记事的民族将木刻送进了博物馆，而且还为他们培养出自己的大学生，甚至还有硕士、博士、专家、学者、教授。

少数民族教育是云南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云南的少数民族教育呢？除了要借鉴国内外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先进理论、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每个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使云南省的少数民族教育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最终使云南的少数民族教育跟上时代发展的节拍。恰巧在这个时候，由中央教科所韩达教授领衔申报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中国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多卷本）》获得批准，并将 11 个民族的教育史分给云南省撰写。为落实这项任务，由云南省教委教育志办公室和云南省教科所牵头，联合云南教育出版社、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及云南省民委文教处等单位和部门，于 1993 年 11 月 27 日召开了“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成立会暨第一次专题研讨会。会上，编委会根据总编委的要求将哈尼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等 11 个民族的教育史分别分给云南省教科所、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学院、怒江州教委等几个单位的 10 多位专家学者撰写。

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少民族没有文字或者文字出现得较晚。汉文史籍中关于这些民族的史料也极少，相应的教育史料更是少之又少。往往在一个民族的简史简志中，提及教育的多则几页，少则一二行。史料的阙如给撰写教育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加之，很多珍贵的档案又在战乱匪患、历次政治运动及行政隶属的变更中丢的丢、毁的毁，这又更进一步加大了各民族教育史的撰写难度。

为了写好这 11 部教育史，编写者们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马不停蹄地查档案、跑书店、泡图书馆、爬雪山、涉寒水、过溜索、乘竹筏、穿越茫茫原始森林、走村串寨、拜访名流，苦苦寻找一切能找到的有用史料。为了寻找史料，有的人甚至还冒了生命危险！今天，他们终于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铸就了一部部掷地有声的专著。真是可喜可贺！

云南各民族教育史有自己的特点，研究少数民族教育史就应该充分表现这些特点，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各民族教育的好传统。因此，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各民族的实际出发，从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研究和展现各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特点。少数民族教育有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云南大多数民族原先无文字，文化依赖于口头的传承，记事采用刻木和结绳的形式。学校教育的历史短暂。非学校教育则贯穿于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始

终，在形成各民族的文化、特色、精神、向心力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应当重视学校教育、非学校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和它们之间的互相结合及互补关系的研究，使之相得益彰。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各民族教育史的全貌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了加深这一认识，就需要用历史事实来解释和证明这个道理，从而运用到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的实践中去。

这里所说的非学校教育，主要是指各民族的传统教育，包括社会道德、生产劳动和宗教教育，是各民族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各民族传统教育尤其重视尊老爱幼、互相帮助、乐于助人等方面的道德教育，这和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重视德育工作是一致的。因此，应当继承这个传统，使之融合于社会主义德育之中，发扬各民族的优良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振兴中华服务。在少数民族传统教育中，生产技术教育、家庭教育、儿童教育、勤学教育等也颇有特点，应该在教育史研究中给予充分注意，借鉴创新，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从总体来看，这11部教育史基本达到了预期的要求，每部书都对各民族的原始教育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这在以前的类似的著作中是少见的，这正是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史的特点所在。我们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时，有时又恰好忽视了少数民族传统教育这一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正如陶天麟同志在《怒族教育史》中所说的那样，为什么怒族（当然还有不少相似的民族）会将民国政府的教育视为兵役？为什么基督教传入怒江的时间比学校在怒江建立的时间晚，而基督教能征服半数以上的怒族？为什么基督教徒均通晓傈僳文而学校却只能为福贡、贡山、碧江等地培养出“几个稍可做事的人”？原因何在？除其他众所周知的因素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民国政府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时奉行大汉族主义，没有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视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不愿遵循不同文化交流的规律办事，在少数民族中推行强迫式的、打骂式的汉化教育。这便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诸如此类的真知灼见在每本教育史中均能找到。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少数民族教育就不存在历史上曾有过的不健康因素呢？恰恰相反，这些类似的问题在今天的少数民族教育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从这些少数民族教育史中，我们的确能找到对发展云南省民族教育事业有益的东西。它对于少数民族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指导意义。对继承和发扬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改革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它的出版不但可以为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佐证，更重要的是它还填补了中国教育史学的一项空白，堪称教育史学界世纪之交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云南教育界的一件大事。

读完此书，吾甚爱之，有感而发，故以为序。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第四卷》编辑出版人员

总策划

何学惠 陈庭贵

责任编辑

沈正德 董晓云 肖功川

王璠 刘苹 陈路

责任校对

马建生 张志红 吴华娟

李林 朱红明 李寒松

顾蕾 贺文 易晴霞

整体设计

黎国泰 高伟 苏鸣生 鲍翰

责任技编

汤家力 荣璟



本卷总目录

哈尼族教育史	1
傈僳族教育史	137
佤族教育史	199
拉祜族教育史	293
景颇族教育史	391
布朗族教育史	479
阿昌族教育史	573
普米族教育史	621
怒族教育史	717
德昂族教育史	837
独龙族教育史	943

哈尼族教育史

HANILU

JIAOYU SHI

陶天麟 薛丽云 张文华 / 著



